

中国航校的日本教官林弥一郎

被中国共产党感动的外国人

半疑，而弹尽粮绝无处可逃的他们只能接受投降。随后，八路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承诺。多年以后林弥一郎在他的《我与中国》一书中，十分感慨地写到，简单、庄严的受降仪式让他终身难忘，八路军还千方百计找到大米送给他们，中国自己的官兵能吃上一顿高粱米饭，都是天大的奢侈，能这样对待300多名日本俘虏体现出了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人道、真诚。

曾克林又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宴请了林弥一郎等几位俘虏代表，席间重申了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并告诉他们战争已经结束了，希望他们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让他们回到机场看管维护好飞机，等待上级领导的指示与安排。临行前还送给林弥一郎等人5头牛和几十只羊，林弥一郎等人惊讶不已，被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感动的同时，更加感受到人格得到了尊重，生命有了保障。

一把小手枪坚定了决心

曾克林把林弥一郎等人投降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和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彭真和伍修权决定一见这些日军飞行员俘虏。随后，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俘虏代表被送到沈阳，彭真和伍修权亲自接见了他们，再次向他们讲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结束了，希望他们为我党筹备航空学校提供帮助，并承诺等时机成熟，就送他们回国。

在谈话的过程中，林弥一郎目不转睛地盯着伍修权腰间一把精致的小手枪，最后向伍修权提出把这支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一个俘虏竟向中共高级别指挥员索要手枪！后来伍修权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过，这把手枪陪伴他走过万里长征，经历过无数次血与火的生死考验，是他心爱之物。为了表明共产党人的坦荡与真诚，伍修权毫不犹豫地把手枪交到林弥一郎手上。林弥一郎后来回忆说：我望着他充满信任的眼睛，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当场表示愿意帮助中方创办航校。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就成立了航空小组，负责人之一常乾坤作为最早一批航空小组成员到达东北。1945年10月中共东北局决定组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林弥一郎飞行大队的全体人员、飞机、器械等全部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林弥一郎被任命为主任教官，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这位主任教官在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诸方面尽职尽责，严格要求学员。在别人对他的严格不理解的时候，他都会严肃地说：我身为教官如果不严格要求，就是对学员、对中国不负责任。从这所学校里走出160多名飞行员，有23名飞行员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当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沸腾，中外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夜诞生。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的张积慧、林虎、王海、刘玉堤等战斗英雄，都是林弥一郎这位教官的学生。

和平使者

1956年8月林弥一郎回到了日本，中国共产党人兑现了承诺。此时的国际格局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麦卡锡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盛行。从社会主义中国回到日本的日籍八路军、解放军老战士生活环境严峻，被怀疑、监视、指责。老战士们成立了多个民间组织，用亲身经历揭露侵略战争的本质，呼吁人们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呼吁世界和平。

林弥一郎曾担任过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他说过，从对待日本战俘的处理、对日本不索要战争赔偿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始终贯穿着和平友好的方针，他要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推动中日友好作贡献。

这样一位反对战争、呼吁和平、帮助中国共产党创立航空学校的日籍教官，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1977年5月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邀请林弥一郎夫妇访问中国，1985年1月彭真、伍修权在北京会见了林弥一郎，1986年东北老航校纪念建校40周年，空军司令员王海会见了当年的老师林弥一郎，1996年老航校建校50周年，再次邀请林弥一郎访问了中国。

1999年8月，林弥一郎在生命最后的日子，还对身边的人说：帮助中国共产党办航校没有后悔，身为教官是他的骄傲。

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中，女性实业家不多，汤蒂因（1916—1988年）是比较知名的一位。她从封建旧家庭的一名学生，一路奋斗成长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优秀工商业者。

民族工业家

汤蒂因的人生起点非常平凡，引领她走向社会、走向实业的是自立自强的精神品质。

她有一股抵抗世俗、追寻独立自信的力量。汤蒂因出生在上海，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浓厚。虽然小学成绩优异，但是父母并不打算继续供她读书。于是汤蒂因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应聘益新教育用品社，14岁时成为金笔柜台的店员。她一直勉励自己要争气，每日早出晚归、勤学多思。凭借拔尖的销售业绩，两年内她被连升两级，成为进货部主任，这让她感到扬眉吐气。没想到，老板这时要娶她作妾，并让她全面接管店面。汤蒂因坚决反对，“宁做天上鸟，不做地下小”，毅然离开该公司。随后她设立了现代物品社，面向全国批发邮购文具，自己当了老板。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生意无法开展。汤蒂因在友人的帮助下，1938年远赴昆明开设现代物品社昆明分店。开业伊始受到当地人的排挤，一周都无人登门。汤蒂因当机立断，向周边区县以及较远地区发放商品介绍和价目单，受到欢迎。头脑灵活的她还将生意拓展到军政机关、学校及群众团体中，因为这些单位内迁人员居多，很受欢迎来自城市的货品，销路自然打开了。

我国制笔行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中起步较晚的。金星、新民等国产金笔刚问世

心向光明的企业家汤蒂因

□ 田 耕

就遭到美日等帝国主义经济的倾销排挤，发展艰难。汤蒂因有一颗爱国之心，在做销售时，她经常重点推荐国货，还利用进货职权不进或少进洋货。自立门户后，汤蒂因借鉴美国派克金笔的做法，开发绿宝金笔。在笔挟上小的斜方块里嵌上绿色，以“绿宝标记，终身保用”为广告语，逐渐在国内创出了牌子，保持着可观的销量。抗战胜利后，1947年，汤蒂因独资创办绿宝金笔生产厂，真正走上民族工业家的道路。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推行经济紧急措施，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货物滞销，企业濒于破产。

优秀工商业者

新中国成立后，汤蒂因的企业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植，恢复生产并得到发展。1950年，新中国配给绿宝金笔厂制造笔尖的贵金属原料，人民银行也给予贷款，解决了原料资金不足的问题。国家还通过国营经济收购和开展城乡交流等措施，助力各企业发展。汤蒂因心生感动，加之曾参加赴朝慰问团，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她立志要做真正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爱国工商业者。1953年，汤蒂因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绿宝金笔厂北京分厂是当地工业第一个公私合营厂。

1954年，汤蒂因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她见到周恩来总理，汇报了企业公私合营情况。周总理听了汇报后说：很好，但是你不能光是自己厂合营就算了，应该带动同业争取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句话给了汤蒂因很大鼓舞和力量。她认真学习领会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讲话，

力促制笔行业联名给党中央写申请书，要求全行业公私合营。不久后就成立了行业合营后的上海制笔工业公司，汤蒂因任私方副经理。1955年底，毛主席接见工商业者时，特意鼓励她说：“金笔汤”，你要做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啊！这次会见让汤蒂因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工商业者的幸福和责任。

1979年她参加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激动地在小组会上总结了三个“喜出望外”——即在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得到的定息超出预期喜出望外；党中央宣布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喜出望外；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喜出望外。成为国家主人的汤蒂因，此时真正体会到了扬眉吐气。

制笔行业的典范

回顾汤蒂因的一生，“金笔汤”的美誉与其为制笔行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天赋和磨砺结合，形成她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堪称行业典范。

她有多元的销售思路。一是分析了解顾客。在做销售员时，汤蒂因就善于对顾客因人施策、周到服务。二是货品特色配套。汤蒂因介绍商品时注重突出本店特色，同时做好配套推荐，很得顾客喜欢。三是策划新奇橱窗。汤蒂因用美术字、彩灯来装饰橱窗，在当时很新奇诱人。

她采用精细的管理方式。首先是把好用人关。汤蒂因知人善任，选任少而精。她有5个精通业务的得力助手，他们之间彼此合作得心应手。其次是把好质量关。汤蒂因对原料、零件的挑选非常严格，每道生产工序都推行分段检验，保证货品的高标准高

饕餮纹的秘密

□ 赵燕姣



纳索河印第安人银镯手纹

在古人的意识里，青铜器上的纹饰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装饰，这是由青铜时代器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明白无误地表明青铜器上纹饰在时人心中具有“使民知神奸”的神秘功用。

至于饕餮纹的原形历来仁智互见，或以为是鬼神，或以为是各种幻想动物的集合体，或以为是怪兽，或以为是龙、虎、牛、羊等，但我们更倾向于有学者所提出的兽面就是“铸鼎象物”的物，它们是贪婪的吞噬者和人类的敌人，是需要控制和镇压的对象。如此解释不仅与“铸鼎象物”以“禁御不若”后古人不再遭受魑魅魍魉之害的传说相一致，而且也与上文所提及的饕餮一词的本意相符。

种种迹象表明，商周铜器上的饕餮纹极有可能来自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纹。有学者曾对二者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对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无论是构图形式还是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均与良渚文化上的兽面形象有承袭关系。或有疑者认为二者之间悬隔久远恐难秉承，实则二者之间的连续虽若隐若现却传承有序，在年代上居于二者之间的尚有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

1963年在山东日照两城镇曾发现

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玉琮，这件器的下端两面对线刻的饕餮纹。至于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则见于一种特有的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上，目前已知这种铜牌饰已达16件之多，每件器上的纹饰虽繁简不同，但山顶部披垂到面侧的部分以及眼睛的形状，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极其相像。由此可见，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可视作良渚文化与商代饕餮纹的中间环节，而一种纹饰如此长时间段地流行于大河上下的诸文化体系中实属罕见，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种纹饰所蕴含的信仰、神话的神秘意义，便会自然地得出一种结论：商代继承了史前时期的饕餮纹，这不仅是简单地沿用了一种艺术审美的传统，而是传承了一种文化的信仰，承袭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这无疑在古代文化史中是很重要的现象。

如果我们再将目光放至全球，便会惊讶地发现，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印第安文化中竟然也有类似的饕餮纹。人类学家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一书中，曾记录大量类似的饕餮纹，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海达人银镯上的纹饰，纹饰中的兽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极有可能是幻想中的怪兽，它前似虎，后似鲨，这种以头部中线为分界的两面对称的图案，用一种非透视的方法，在一个图形中同时表现动物的两个侧面形象。再回到中国来看，有学者曾提出，饕餮纹“既表现为物体正面的形象，同时也是表现物

体的两个侧面，我们称这两种结合的方法为整体展开法……这是商周时代的艺匠们用正视的平面图来表现物像整体概念独特的方法，也可以说是透视画法产生之前的一种幼稚的和有趣的尝试”。两相对比可以看出，这两种理念惊人的相似。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和美洲西北岸印第安人，不管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相距太远，我们都知道在进行中外文明对比的研究上，务必保持严谨的态度，特别是要反对唯传播论的观点，可是上述如此相似的现象，也许不仅仅是出于巧合。

很多年以前，张光直教授曾提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他认为这个连续体的地理范围包括旧大陆和新大陆，其时间至少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他认为：“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他们的文化，尤其是美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达程度，远远比我们现在从极有限的考古资料中所看到的要高得多。”“从二、三万年前到一万多年以前，人类通过白令海峡到新大陆，在这个源源不断的过程中，他们具有的文化装备是相当复杂的。在这种程度很高的文化的基础上，后来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就产生了相似的文明社会。”这一假说无疑对环太平洋地区的考古研究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而以上所述或可为这一假设提供个案的支持。